

真与谓述

[美] 唐纳德·戴维森 著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 译丛

译文出版社

真与谓述

[美] 唐纳德·戴维森 著 王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与谓述/(美)戴维森(Davidson, D.)著;王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9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
书名原文:Truth and Predication
ISBN 978-7-5327-4335-3

I. 真… II. ①戴… ②王… III. 语义学 IV.
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2459 号

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Predication

© 2005 by the Estate of Donald David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7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7-27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真 与 谓 述

[美]唐纳德·戴维森 著
王 路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52,000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978-7-5327-4335-3/B·273

定价: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 译丛
Turning of Philosophy: Language and Practice

主 编 庞学铨

副 主 编 应 奇

学术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江 怡 孙周兴 倪梁康 钱 捷

徐向东 韩水法 童世骏 翟振明

总 序

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继续存活于一种对其哲学内涵有所了解的解释学之中。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我们把它称作“实践理性转向”。所谓“实践理性转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学界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元伦理学阶段和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阶段之后，恢复了对于价值的理性基础、规范的根源和辩护，以及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这些实践理性的传统主题的兴趣。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范式、方法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实践理性转向”都可以说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一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语言学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存在论转向”和近代的“认

识论转向”而提出来的,它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范式转变。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语言学转向”兴起之前的两次哲学转向,就会发现,一种哲学范式的真正确立最终依赖于自身规范基础的阐明和辩护。古代哲学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论学说,是其目的论伦理学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目的论的伦理学则是古代存在论的规范内涵;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是道德自主性学说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道德自主性则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规范内涵。按照这样的提问方式,我们很有理由追问,“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是什么?相应地,所谓“实践理性转向”——如果这种“转向”名符其实的话——的哲学前提和基础又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遭遇了“语言学转向”与“实践理性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一贯串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

首先,“语言学转向”对 20 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实践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命题或陈述的三分法,把价值判断放逐到无意义的领域,而元伦理学则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对价值词汇用法的琐碎研究上,放弃了理性地探讨价值分歧和规范基础的重要使命。50 年代以后的“后实证主义”革命冲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樊篱,对价值问题的探讨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是实践理性转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义倾向以及此后继语言哲学而起的心智哲学研究取向,又引发了在规范问题、价值属性和价值判断问题上的新一轮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以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之争。直到 20 世纪末,“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在分析哲学的匹兹堡新黑格尔学派内部,是像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那样继续坚持“语言学转向”,承认拥有信念和意愿仅仅是玩一种运用这些词汇的语言游戏,因而哲学的职责只是阐明我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践,而不是根据外在于这些实践的规范判断这些实践;还是像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那样,在坚持不具有概念结构的东西无法证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坚持非判断的心理事件能够证明信念的合理性,从而得出“除非知觉现象不同于判断,否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由”的结论,这已经成了一场震撼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界并且波及德语学圈的大争论。而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语用学的“真理共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和法国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倡导的“语境论”之间的辩论中,又出现了对于民主的规范含义的不同理解:对于真理共识论者来说,民主是基于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识;对于彻底的语境论者来说,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种排他性的团结。诸如此类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对“语言学转向”究竟要转向何处心存疑虑。

其次,尽管实践理性是西方哲学的固有传统,但当代的“实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复兴”又有它独特的背景和前提。实际上,从“语言学转向”到“实践理性转向”的演变昭示我们,这两种转向之间不但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是绵延整个 20 世纪,横跨英美与大陆两大传统(新法兰克福学派中有把实用主义独立出来,与分析传统和现象学传统鼎足而三者)的基本范式,就此而言,它不但构成了“实践理性转向”的背景,而且为后一种转向创造了条件,或者说为更好地阐明自身的规范内涵创造了条件,这尤其表现在滥觞于日常语言哲学并经与美国实用主义互释后产生的所谓

“语用学转向”中。另一方面,作为“实践理性转向”之重要一环的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勃兴则不但在智识氛围上呼应了心智哲学在20世纪晚期哲学中日渐上升的地位,而且从智识效能上对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于宣告分析哲学已死,“语言学转向”这一范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哲学中的(与语言含义相关的)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心智哲学中的(与心智内容相关的)个体主义与反个体主义之争,以及实践哲学中的(与规范辩护相关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这三者之间的纠结和紧张将引领人们重新审视分别由分析学派和现象学派在20世纪初以反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名发起的哲学革命的潜能是否已经消耗殆尽,而这不但关乎自古希腊以来即已奠基的作为理性守护者的哲学事业的命运,而且与人类对于自身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

上海译文出版社历来重视当代西方哲学重要著作之译介,所创设之“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更是在学术界享有良好的声誉,深受读书界的喜爱。“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踵武前贤之事业,尝试以更为主题化同时也更富时代感的方式系统地译介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的代表性成果。一方面旨在围绕关于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争论,集中展示语言分析传统对于价值与规范的理性和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重视把分析传统与现象学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家的著作;另一方面试图较为全面地呈现“实践哲学复兴”中道德哲学(包括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方面的优秀成果,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对古典哲学的根

本问题和现代性的根本内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性的探讨,还涉及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我们期望并且相信,根据对于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上述理解和把握,按照问题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哲学同仁们艰苦、扎实、细致的工作,本译丛必定能够把中国哲学界和出版界的西学译介工程真正推向深入,促进学术界对于 20 世纪西方哲学建设性成果的全面总结,并最终为当代中国的哲学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滋养。

本译丛得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支持。

庞学铨 应奇
2007 年 1 月于杭州

译 者 序

戴维森(1917—2003)是当代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他生前著作不多,发表的主要是论文。但是他的文章和思想影响极大。关于他的思想的学术研讨会,世界上开了将近 20 个,关于他的思想研究的著作出了 20 多部,他的成名论文“真与意义”(Truth and Meaning)是被选编和引用得最多的文章之一。他到许多国家讲过学,他的一些文章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一句话,他不仅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且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戴维森生前出版了三本文集:《行动和事件论文集》(*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1980),《真与解释之研究》(*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1984),《主观的、主观相互的、客观的》(*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ctive*, 2001),去世后又出了两本文集:《理性的问题》(*Problems of Rationality*, 2004),《真、语言与历史》(*Truth, Language, and History*, 2005)。

《真与谓述》(*Truth and Predication*, 2005)是戴维森唯一一部自己撰写的著作,它是在两个系列讲座(1989—1990 年;2001 年)的讲稿基础上修改形成的。不过,这部著作是在他去世以后由他夫人和几个朋友帮助出版的。与他去世后出版的两本文集不同的是,那两本文集已经准备就绪,只是导论未写,而

这本著作基本完稿,也写了序,但是还留有一些注释,这些注释表明戴维森本来还想做一些修改。

戴维森的思想值得关注和重视。在我看来,戴维森最主要的工作是意义理论。他高度评价弗雷格的思想,认为正是由于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所指的区分,我们才知道如何探讨意义问题。但是他又深刻地指出,局限于涵义和所指的讨论将使我们重新回到经验的老路上,甚至走进死胡同。因此他另辟新径,从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出发,探讨一种不依赖于经验的绝对的意义理论,也叫真之理论。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几十年来,他反复探讨这一问题,同各种不同观点进行论战,特别是真之极小论、真之紧缩论和真之符合论。如果仅从他发表论文的内容看,他的论述有不少重复,一些论述不乏相互矛盾之处。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从事哲学研究的科学态度,而且他的工作不仅在不断深入,还启发带动了一大批哲学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

我对戴维森的思想说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除了对于意义理论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以外,我有一点深刻的感受,这就是逻辑与哲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戴维森专门论述这两者关系的地方很少,但是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是在本书,几乎无处不体现着这两者的关系。戴维森强调弗雷格思想的重要,这是因为他知道是弗雷格为我们今天分析语言,分析意义提供了基本的方法,特别是定义谓词的方法和刻画量词的方法,因而我们都使用这样的方法。戴维森运用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成果,这是因为他在他看来,谓述问题是贯串哲学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和难题,而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为解决这个问题最难的部分提供了技术,依靠这种技术,使我们获得一种语义方

法,以此可以检验有关自然语言句子的逻辑形式的一部分理论。所以,戴维森探讨的是真之理论,但是他的探讨过程始终也没有离开过逻辑。奎因认为,分析哲学的特征就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现代逻辑,越来越关注语言的性质。有人对此可能会不以为然,但是戴维森的著作无疑充分体现出这两个特征。

不少人认为分析哲学颠覆了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分道扬镳。读一读戴维森的著作就可以看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我倾向于认为,应该在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意义上理解形而上学。这样,过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都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同样,分析哲学的研究也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分析哲学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方法。哲学史的延续是思想的延续。方法的变革则带来哲学思想的进步。是与真的联系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是从哲学的显赫地位逐渐隐退,真的核心地位从隐蔽到凸显,反映了哲学方式的变化和哲学研究的进步。像戴维森这样的分析哲学家,始终是站在哲学史研究的主线上,思考着哲学的核心问题。因此,他才是重要的哲学家,他才能被称为“对人们有帮助的哲学史的解释者”,他的影响才会是重大而深远的。

《真与谓述》不仅是戴维森的惟一一部专著,也是他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在我看来,这是他关于自己一生研究真之理论这个问题的总结,因此是非常重要的。

十几年前,我翻译了奎因的《真之追求》,写了一个很长的序,说明应该将“truth”翻译为“真”,而不是“真理”。这些年也写过一些东西,专门论述和探讨过这个问题。表面上这是翻译的问题,其实却是理解的问题,即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眼前这本《真与谓述》,展示的无疑是戴维森本人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但是

也隐含着我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比如把“truth”翻译为“真”,而不是“真理”。人们常说中西哲学乃至思想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说法固然不错,却有些笼统。其实,一些基本概念实实在在地反映出这样的差异。在我看来,西方哲学中,“是”(being)是这样一个概念,“真”(truth)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感谢我的学生马明辉!他帮助我录入了索引的英文部分。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张吉人先生!他热情支持并积极参与了出版本书的工作。

译 者

2007 年夏

前 言

我丈夫去世的时候,这本书已经被哈佛大学出版社接受了。它们只是在等他的最后修订。为了回应出版社以外的读者,他自己做了一些旁批和注释,这些旁批和注释提示,一些修订本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在他的意图十分清楚的地方,我相应地改动了文本;在他的意图不是十分清楚的地方,我把注释或旁批放在带方括号的脚注里。当然,如果还有时间,其他一些改动无疑是他会想做的。

我衷心地感谢费特尔森(Brandom Fitelson),勒波尔(Ernie LePore),路德维希(Kirk Ludwig),尼尔(Stephen Neale)和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他的注释在文本中常常出现),他们帮助我将我丈夫的手稿最后定稿。他们无私慷慨地奉献出时间和精力表明他们赞同我的丈夫和这本书。卡奇里安(Arpy Khatchirian),一个在过去两年多一直与我丈夫一起工作并为我丈夫工作的研究生,在最后定稿过程中也提供了帮助。

玛西娅·卡维尔(Marcia Cavell)

序

本书的许多材料包含在两个系列讲座中,或者说是根据它们重写的。第一组讲演构成了杜威讲座的第六个系列,是我于1989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杜威讲座是1967年为纪念杜威而建立的。我的第一讲是“真之结构和内容”,11月9日做的;第二讲是“真与知识”,11月16日做的;第三讲是“真之内容”,11月20日做的。1990年,它们以《真之结构和内容》为题作为《哲学杂志》的一期发表。为了这一期杂志,对所有这些讲演稿做了改动和重新安排。第二组讲演是佩鲁贾大学的赫米斯讲座的开幕讲演,这一回有四讲,是2001年5月做的。这一年5月后来我应里斯本语言哲学研究所的邀请在那里做了弗朗西斯·桑切斯讲座的首讲系列报告;它们包含赫米斯讲座的材料。2001年10月,我在维也纳大学做了四次讲演,与赫米斯讲座相同,根据我的知识背景对内容做了一些改动,翌年11月,我又在雷克雅未克的冰岛大学吉尔法松(Thorsteinn Gylfason)主持的讨论班上读了这些(再次改动过的)讲稿。

尽管这是一本小书,我却要感谢许多人。我在杜威讲座的讲演受益于彼尔格拉米(Akeel Bilgrami)、勒波尔、列维(Isaac Levi)和奎因等人的有益建议和友好鼓励。关于谓述的讲演,我需要许多帮助,而且,由于不耻下问,我得到了慷慨的

回报。我面对每一个友好的人都要问两个问题：谁讨论过这个问题；谁解决了这个问题。回答全部集中在第一个问题，并且是由彼尔格拉米、伯奇(Tyler Burge)、科德(Alan Code)、达米特、弗雷德(Michael Frede)、勒波尔、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麦克法兰(John McFarlane)、斯鲁加(Hans Sluga)、斯特劳特(Barry Stroud)和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等人提供的。我在伯克利主持过一系列关于真与谓述的讨论班，我的学生一如既往，源源不断提出精彩的问题、批评和建议。在佩鲁贾，文蒂(Carlo Vinti)、皮埃雷蒂(Antonio Pieretti)和玛尔切蒂(Giancarlo Marchetti)保证我在精神上和其他方面受到热情周到的接待。在葡萄牙，萨古阿(João Sàágua)是我聪明热心的良师益友。在维也纳，穆拉斯(Gabriella Mras)细致地为我提供材料需要，并且支持我在历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弗雷格的研究。我对尼尔的感谢一言难尽：当我第一次在佩鲁贾讲演的时候，是他做的介绍，他还在讲演后的讨论中提出很好的问题，以此促进了讨论。后来在书信和交谈中，他慷慨地做出详细和极其有用的评论和建议。在冰岛他再次与我同船。对于他友好的兴趣、支持和富有同情心的建议，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杜威讲座的文本在杂志上业已发表，也引起一些批评和评论，因此我让它们基本保持原样。主要的变化是做了脚注说明。关于谓述的讲演以较早的形式用意大利文发表过。我在这里对它们做了修改，有的是要删除与关于真的讲座重复的内容，有的是要吸收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外读者们的慷慨建议。我必须专门对三位学者表示感谢！听说我要把这两个系列讲演合成一本书以后，他们仔细阅读了这些讲演稿。这三位学者是帕

森斯、希金博特姆(James' Higginbotham)和伯奇,他们同意在这里提到他们的名字。

唐纳德·戴维森